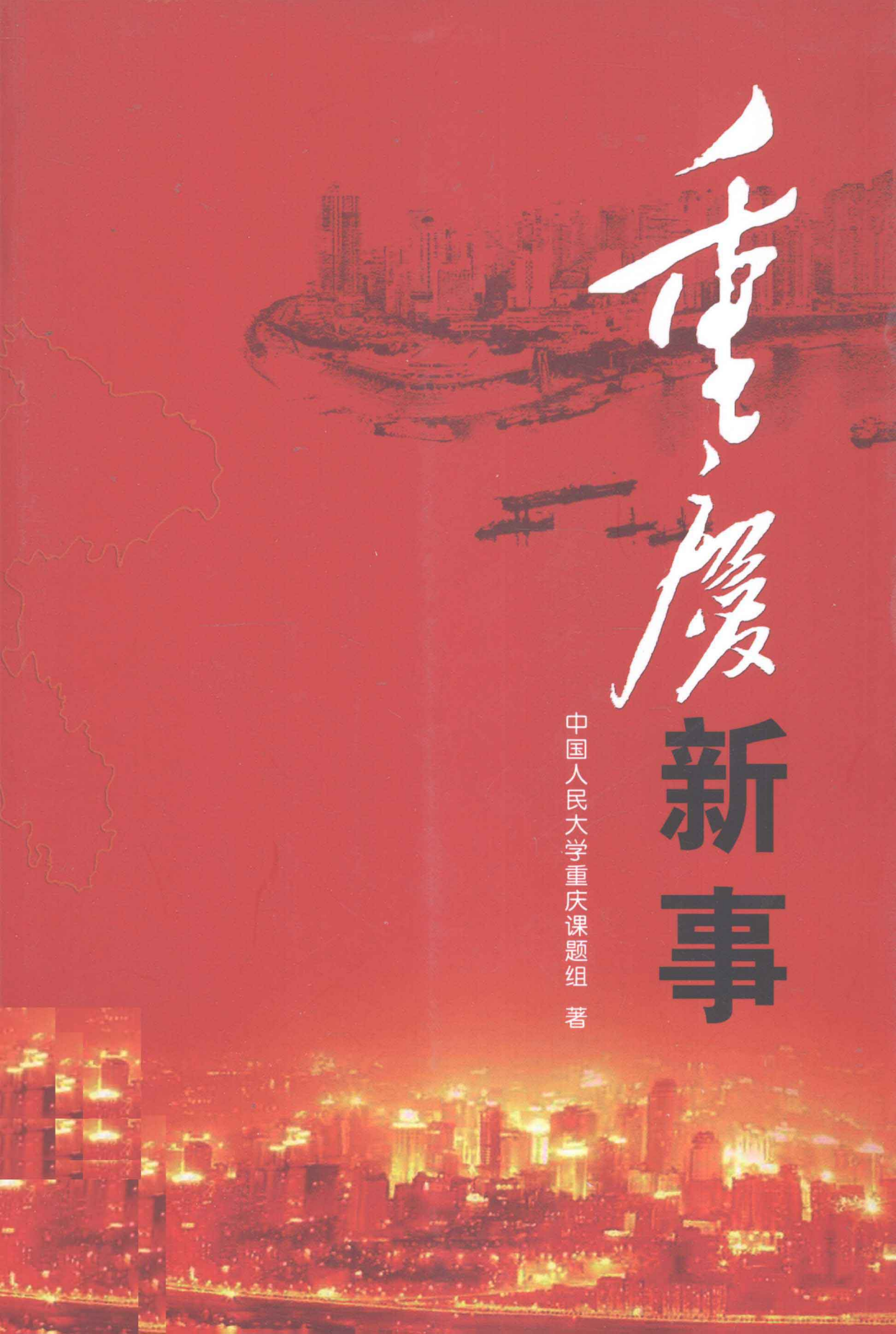




重慶新事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课题组 著



重庆新事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课题组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新事/中国人民大学重庆课题组 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300-14290-6

I. ①重… II. ①中… III. ①重庆经验-研究 IV. ①F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4910 号

重庆新事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课题组 著
Chongqing Xin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 × 25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9.75 插页 1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5 00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言

重庆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自1997年直辖以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年来，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自身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于一体的市情特点，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改善民生为导向，以“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为载体，以法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作风建设为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嘉陵天气好，百里见双流”，在重庆这片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上，发生了一系列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新事”。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历来有关注社会、关注实践、关注民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传统。对重庆的做法和经验进行客观性、学术性和阶段性的总结、研究，是我们应该自觉承担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不少学者较早地关注重庆的实践，并产生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与重庆有关单位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10年10月，我本人和冯惠玲副校长率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考察团赴重庆考察。考察团的成员来自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国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和法学院等不同学院和学科。薄熙来书记和黄奇帆市长会见了考察团一行，并详细介绍了重庆市科学发展的思路、举措和成绩。考察团一行还先后参观考察了重庆规划展览馆，土地交易所，人和街小学“唱读讲传”活动，交巡警平台，西永微电子产业园，重庆大学及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打黑除恶”展览，民心佳园公租房建设，合川区“三项制度”、“三项活动”、大学生村官的情况，大渡口区户籍制度改革等，对“重庆新事”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和体验。

以此次教授考察团为基础，学校成立了“重庆新事”课题组，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重庆新事”进行梳理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温铁军教授、秦宣教授、刘元春教授、段成荣教授以及其他师生又多次到重庆进

行实地专题调研，在重庆市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帮助下，通过走访、座谈收集了大量一手材料和数据。课题组又对调研报告进行了多次研讨和反复修改，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重庆新事》这本书。

重庆一系列的做法和实践，既有对以往有效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的继承，也有新形势下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的集成创新，是结合市情、区情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有益探索，是统筹兼顾发展与分配、公平与效率、城市与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自觉尝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之所以把重庆的做法和实践称作“重庆新事”，而不是“重庆模式”或“重庆道路”，是因为重庆的实践是不断发展丰富的，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2011年7月，重庆又明确地把促进共同富裕纳入中心工作，并出台了缩小“三大差距”的切实可行的举措。这一决策在地方党委政府中是开先河之举，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新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改革开放，要有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的探索精神和实践精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重庆新事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潮中留下浓浓的一笔。

《重庆新事》一书夹叙夹议，结合重庆实践，力求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经验进行客观地总结、梳理和初步研究。此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作，但是带有一定的学术性，为研究重庆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由于时间仓促，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

目录

第1章 从“GDP旧政”到“民生新政”——重庆经验的政治经济解读 1

- 1.1 引子：20世纪三大潮流下的中国和重庆 2
- 1.2 重庆经验的政治经济解读 11
- 1.3 重庆经验的意义 43

第2章 土地增值、产业增长与民生发展——重庆改出粗放发展模式的经验分析 50

- 2.1 现实问题：对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51
- 2.2 对重庆经验的简单归纳 53
- 2.3 对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扬弃 64
- 2.4 小结 67

第3章 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建设中西部开放高地 69

- 3.1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筑经济发展基础 69
- 3.2 创造性全面布局，打造中西部开放高地 84

第4章 依靠群众路线改善乡村治理 99

- 4.1 农村治理问题产生的宏观背景 99
- 4.2 依靠群众路线，走出乡村治理困境 102
- 4.3 群众路线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109
- 4.4 “三项活动”与“三项制度”的维稳机制分析 115
- 4.5 综合“创旧”属于重构低成本的乡村上层建筑 118
- 4.6 结语 121

第5章 发展中国家的“灰色”困境——从国际经验看重庆“打黑”的现实意义 154

- 5.1 现代化“凯歌”中的“灰色地带”萌生 156
- 5.2 “改出灰色”的海外经验——以香港为例 161

5.3 我国“灰色经济”与“灰色治理”的产生脉络与现状	164
-----------------------------	-----

第6章 重庆的软实力建设——谈重庆的“唱读讲传” 211

6.1 重庆“唱读讲传”的缘起及深层原因	211
6.2 “唱读讲传”活动的特点	215
6.3 “唱读讲传”的积极影响及启示	219

第7章 城乡统筹中民生建设与经济结构转型 223

7.1 “一圈两翼”战略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23
7.2 盘活国有企业，以“第三财政收入”确保民生建设投入	226
7.3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强化民生建设	229
7.4 城乡统筹：可能的“薄黄拐点”	245

第8章 着力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制度体系 249

8.1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要求	249
8.2 以解决农民工问题为突破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252
8.3 着力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制度体系：重庆的经验	260

第9章 对策与行动——重庆市应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研究 265

9.1 同一片蓝天下：我国的农民工子女问题	265
9.2 “农村直辖市”的农民工子女和应对农民工子女问题之策	271
9.3 应对农民工子女教育保护问题的具体举措	275
9.4 关于进一步推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	286
9.5 对策与行动——重庆市解决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经验借鉴	288

第10章 重庆的全方位发展——谈“五个重庆”建设 293

10.1 “五个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追求	293
10.2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实践	298
10.3 “五个重庆”建设的启示	303

第1章

从“GDP旧政”到“民生新政”^[1]——重庆经验的政治经济解读

本报告首先简要综述20世纪的三大发展潮流，以及由其推动的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的“GDP旧政”和这一发展主义体系的全球扩散，进而指出，这一潮流的扩散已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灰色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灰色治理”。

在此复杂背景下，本报告试图以重庆经验为主题，分析重庆自21世纪初以来为走出“GDP旧政”、迎接“民生新政”而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调整。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在确立报告基调的讨论中，一直努力超越关于重庆经验的左右翼的一般争论^[2]，从不同于“精英之战”的大众视角，提出群众翘首以盼的“中兴之治”、新一代政治家必须“改出灰色”等讨论性观点。

为了便于大众理解重庆经验到底是什么，我们努力将重庆经验的复杂过程简化归纳为“一二三四五”。固然不甚符合当代学科理论逻辑和表达习惯，但主要是因为重庆的实践内容之丰富远非既定学科逻辑所能囊括，与19世纪末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亨利·乔治“单一税制”的社会理想、20世纪初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政治理想以及当代作为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总地租”的经济理想，都有很强的呼应。故此，课题组以《政府工作报告》中常常采用的概括方式作出提炼，冀盼借此对重庆正在进行的蕴涵中国经验的政治经济调整进行解析：

“一个优势”，就是利用并且发挥中国特色的能够“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势。可与之相比较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胶东、苏南、浙北等沿海发达地区推进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的“政府公司化”发展经验。

“两个跨越”，就是跨越山区经济地理资源硬约束的城市地产扩张和跨越传统产业结构约束的高端外资扩张。这不仅相当于改变了时空条件来推进城

市化和工业化，而且初步形成了以“八大投”（重庆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为主的大型国企资本和惠普电脑为代表的大型外企资本占据重庆经济主导地位的新局面。这就不仅需要全面清理以往非规范的中小资本为主的“灰色经济”所占领的经济阵地，还得清理政府部门与警治队伍中与之相应的“灰色治理”。

如此重大的经济基础的改变势必蕴涵着重大的社会变革。于是——

“三项运动”，就是这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社会变革。通过重庆政府所大力推进的“三项活动”、“三项制度”和“唱红打黑”等，切实扭转了90年代以来长达20年的“去政治化”所造成的干群关系紧张等社会张力无处缓解、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局面；同时，通过建设国民信心的政治和社会运动，重新启动了上下联动的国民政治动员。由此，一方面相对有效地实现了广大民众的“再政治化”；另一方面也为短期发生的两个跨越——地产和外资的大规模扩张——奠定了降低交易费用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

“四个转型”，则是对这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变迁过程的全面客观归纳，指重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这四个方面“改出灰色”的中兴之治——针对近年来经济混乱所引发的社会冲突日趋普遍的严峻局面，在制度方面进行的借鉴历史经验的“创旧”和因时制宜的创新。

“五大重庆”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生态文明理念，又形成了重庆可持续发展的预期目标，亦即重庆提出的“民生为本”的五个建设目标。政府通过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十大民生工程，巩固新制度的社会动员基础，从而带来“以人为本”的新世纪的新文明曙光。

1.1 引子：20世纪三大潮流下的中国和重庆

课题组认为，需要将重庆置于20世纪的世界潮流和中国变化的历史场景中，去分析重庆的发展经验和历程，才能凸显重庆经验的普遍意义，及其可借鉴性。

回望整个20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过程，似乎很大程度上在应验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3]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无论何种制度条件下的政府，都直接遭遇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的困局，普遍地形成“亲资本”的政策体系，遂使劳动者越来越退居到劳动产品和利益分享的二线去被

动地承载发展代价，而“工人之外的他人”则成为资源资本化的制度收益的主角。

20 世纪的百年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以发展主义现代化作为基本背景，“发展”、“市场”和“全球化”这三股潮流接续兴起，推动了异化劳动的逐步深化，并不断将其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全球扩散过程中，“工人之外的他人”——资本所有者不断获得劳动者的产品，使得资本异化于人类并逐渐获得主体地位和支配地位。于是，这个不断异化人类自身的资本主义文明，便在全球日臻成熟地走入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最后阶段。

据此，回顾整个 20 世纪的政治经济过程，如下四个字即可概括：“以资为本”。

“以资为本”从物质财富到意识形态的扩散，在其广度和深度上，无论如何形容，都难以尽言。从资本全球化的各个特征看，都像马克思所言的那个“幽灵”^[4]，而且不仅在欧洲，还已经在全球每个角落游荡。若能从更深一个层次理解，这是一个玛门（即“财利”）的幽灵和巴比伦系统的全球复制，并由于其势力的无处不在，正在促使我们思考本课题组早在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时就已经讨论过的资本的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化相结合的重大历史转向问题。^[5]

站在 21 世纪的最初十年，每一个思考者和行动者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富有转折意义的难题：如何走出人类自进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至今已延续了数百年的“以资为本”的发展主义价值体系，重新认识“人”和“物”的关系，并在人类政治经济活动中有所体现和反应？其背后的深层意义在于：人类作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和主体地位的物种，怎样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克服被资本全面异化，从而恢复其主体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即使在十分强盛的时候，也并没有走上西方意义上的殖民扩张。那么在这轮中国崛起的世界经济地理变迁中，中国能否再次脱出于西方的发展主义窠臼，既利用和改造现有“以资为本”的全球化体系，又走向各国在话语实践中已经倡导的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民生新政”，从一个全球制造业产品总量第一的大国转向“全面中兴”的政治经济过程？进而，我们再思考中国经验的全球意义甚至人类历史价值：在转向包容性增长方面，中国各个地方的创新实践和创新竞争，有没有蕴涵人类在新世纪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曙光？

这些思考，是我们学习和解读重庆经验的基本出发点。

1.1.1 三大潮流

20 世纪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值得记忆，因为已经注定被标记为发展主义的现代化进程。

发展主义现代化对人类历史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可能是迎合并实现了人类物质欲望永难满足的本性，因而具有“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深层意义。其主要标志是提出并实践了如下四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化名词：“现代化”、“发展”、“市场化”和“全球化”。其中，“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是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来的，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潮流的基本背景，引领了人类社会进入“摩登时代”，也同样成为了后面三个名词的基本底色。“发展”（development）一词是在 40 年代内涵开始转变的，在 50 年代与“现代化”融合，使得“现代化”成为“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成为“发展”的核心手段。“市场化”（marketization）一词则是在 70 年代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兴起的背景下，作为扩散“现代化”的一个工具出现。其目标是走向经济自由，附带政治民主，相信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具有自发秩序。“全球化”（globalization）则是 80 年代末适应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全面过剩、寻求全球扩张而开始兴起的一股潮流，为了实现资本全球自由流动而推进一系列“制度变迁”，意图实现“现代化”、“发展”和“市场化”的全球扩散。

1. “发展”潮流

“发展”一词最初来自“殖民开发”。在二战之前，“发展”不具有现在认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所谓进步的含义，而是表述为文明社会改造和开发非文明社会的正常过程，其主要方式是复制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等，实现非文明社会（主要是殖民地）的文明化（宗主国化）。

二战以后，随着殖民地解放、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和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发展”经历了以物质财富积累为中心的经济增长观（以战后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代表），以社会文化观念更新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观（以布莱克现代化理论为代表），以社会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以托达罗综合发展框架和佩鲁新发展观为代表），涵盖经济、社会、生态和人类发展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以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可持续发展观和阿马蒂亚·森真实自由观等为代表），以及中国作出首创贡献的融汇现代手段和目的的科学发展观。

上述五个发展观内涵的变迁，凸显了 20 世纪在寻求民族独立、解除宗主

国的殖民主义压迫和统治的过程中，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纳入西方现代模式的“发展主义”，尤其是二战之后，“发展”成为主旋律。其中，“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最为显著。“现代化”的两个主要手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不二法门。以至于有人评论说，在人类的智慧范围内，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还没有找到第二条脱贫致富的途径。^[6]

2. “市场化”潮流

这一潮流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恢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并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因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大获全胜而逐渐成为主流。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所描述的：“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7]

市场化崇尚的是经济理性，这来自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理性经济人。市场主义者坚信经济自由能实现市场的自动均衡功能，坚信自利带来他利，带来整个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正如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用反喻法作出的宣言：“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8]自由主义在1989年已经被弗朗西斯·福山断言是“历史的终结”^[9]，他如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一样，相信人类再也找不到比“自由、民主”更好的社会制度。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民主进步的思想相伴随，汇集成20世纪后40年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垮了被称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阵营^[10]，并在90年代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后，完成了天下一统，使得全球都附庸在市场化体系之下。由此，自利的理性经济世界观也从个人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扩散。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范式，在每一个追求发展主义现代化的地区蔓延，汇集成一股市场化并向全球扩散的洪流。

3. “全球化”潮流

这一潮流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市场化潮流的胜利。

柏林墙倒塌后，20世纪主导政治经济格局的两大阵营的分野也消失了。“现代化”、“发展”、“市场化”等浪潮，不再拘泥于国家和地区，也不再拘泥于是名为“资本主义”，还是名为“社会主义”，都被纳入到全球一统的市

场体系之中。交通、通信方面的技术进步,以及互联网的兴起,为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使得全球化畅通无阻地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渗透。

但是各大生产要素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的制度约束大不相同:劳动力要素越来越被护照、签证等卡住,无法自由流动;技术要素也有十分清楚的国家壁垒和产权约束;土地要素本身具有不可移动性。这几种主要的生产要素不得不就地资本化或国境内资本化。而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只是资本要素。^[11]

“现在的全球化,它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劳动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术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诸多生产要素里面,唯独资本全球化了,唯独资本自由化了。其他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已无法调转方向的机制。”^[12]

我们从三大潮流的接续兴起中,很容易看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追随的发展主义现代化,是一条“以资为本”的排斥性发展主线。

可以说,“以资为本”体系的形成和扩散,是20世纪异于以往世纪的最大特征,也是20世纪留给21世纪的最大遗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那些能够在不自觉的继承中自觉地扬弃、注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社会群体,才可能成为人类进步的引领者。

1.1.2 三大潮流下的中国

中国融入全球的三大潮流,也是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努力。20世纪初帝制被推翻,科学、民主等西方思潮不断被引入中国,为中国迎接“现代化”以及后续的三大潮流,不断地扫清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障碍。

中国人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年里默默地维持着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一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国的地位。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多次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惨了之后,才奋起力图融入西方现代潮流。期间,不论历朝历代、各党各派,在发愤图强的激进努力上都高度一致。这不仅表现为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引进器物”为主的“洋务运动”,也不仅表现为20世纪初以“引进制度”为主的“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和被认为具有文化革命意义的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更表现为历届政权甚至在割据一隅稍有稳定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屡败屡战的民族国家的工业化努力,真正能够持续进行和最终实现,则是二战之后1949年中华民族在祖国大陆有了一

个相对稳定的政权之后。

在 1949 年新中国真正实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之始，就开始了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和现代化赶超。1956 年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借苏联大规模投资而顺利开展之际，工业部门为实现“两大部类交换”而率先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到了 1964 年，虽然为了战备而事实上放弃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但还是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目标。^[13]这就通过正式文件表明了中国领导集体的一种愿望：即使在被普遍认为是排斥市场的改革前 30 年，中国也在作着积极地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举国努力。

可见，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发展”虽然没有获得意识形态上的压倒性地位，“现代化”观念却获得了压倒性地位。

不仅如此，知识集团中“科学至上”的激进思想更是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就随“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列上升为民国早期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于后来在以传统农民为主的土地革命胜利之后不仅得以延续，更是被上推为近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国家政权推动这一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排挤其他意识形态为标志）。除了与国家资本紧密结合的科学以外，在很多技术要素稀缺的地方甚至某些技术都在资源资本化的发展主义进程中幻化成为了排他性真理的化身，成为判断一切客观事实的唯一标准。这如同毛泽东时代的另外一个主流意识形态——阶级性——是判断主观倾向的唯一标准一样。实际上，二者之间没有何者为进步之分。

有鉴于此，人们应该注意到：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为了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化而对苏东国家开放，大规模引进约合 54 亿美元的设备和技術；相应地，为了适应这种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构建了符合投资国要求的上层建筑（政府和制度）。70 年代中国为了调整国内工业化偏军重工业的结构而主动对西方资本开放，先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配合引进 43 亿美元的设备和投资的重大举措，后有华国锋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 82 亿美元的西方设备的跟从性安排。随后，则也顺理成章地有了按照西方投资国的制度模式推行的改造原有政府和制度的体制改革。

1978 年后的以工业化为主的国家现代化战略具有显著的延续性，尽管“发展”的潮流滞后于以国家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潮流 30 年。

1980 年以后，为全面适应西方投资所形成的经济基础而进行的上层建筑的改革和进一步对西方资本的开放，全面改造了主流意识形态，并在 1992 年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14]的决断中，不仅完全确立了“现代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压倒性地位，而且也使之跻身霸权意识形态的行列。

同样获得如此地位的另外两股潮流来得更加迅猛：“市场化”洪流同步涤荡了整个中国；不到十年，中国的“全球化”几乎与世界同步地蔓延开来，表现了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后发优势，由此带来了快速赶超效应。

到了20世纪末，中国在现代化观念，对“发展”、“市场化”、“全球化”的接受，以及全面融入这种发展主义的潮流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的模范生。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如此迅疾地融入世界潮流，分享其中的好处，并崛起为这些潮流的推动力量，进一步促进这些世界潮流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扩散。虽然人们开始使用“中国特色”、“北京共识”等多个名词，其意图也是刻画中国的制度创新，但中国在三大潮流上主要还是重复着一个学习模仿的过程，还是一个现代化补课的过程。因为，事实上，在“以资为本”的全球体系扩散中，中国无法做到特立独行。那么，重庆呢？

1.1.3 三大潮流下的重庆

重庆地处内陆山区，是长江黄金水道能够上达的最后一个大城市。^[15]如果按照发展主义潮流下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看重庆，那么在一般情况下，重庆并不具备首先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但是以上所述之中国一百多年来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进程，却把这个本不具备区位优势的重庆率先推上了工业化进程。

我们认为，这主要表现为三次外来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历史性迁入及其带来的制度变迁：

1860年在清朝中央政府衰落、地方势力崛起的背景条件下，以地方政府为主开始了官办洋务运动。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最重要码头，已经开始出现与地方军事崛起相关的官办近代工业，初步打下了工业基础。同时期，经济地理条件的独特性，也产生了码头文化和帮会传统。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当时的陪都，又一次迎来了内迁的中央政府官僚资本的聚集。除了军事工业外，造币、学校、军需体系等的建设，大量近代文化和文人雅士聚集重庆，推动了重庆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进一步上升。

1960年提出战备以来，在中央政府主导的15年“三线建设”时期，重庆作为西南局所在地，得到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支持，借着战备的时代背景，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重工装备制造等重工业体系，又引入了海派文化。

洋务运动、陪都地位、“三线建设”，这三次外来为主的经济迁入和政治文化迁移，使得经济地理条件并不优越、本不具有产业化区位优势的重庆具

有了产业基础，并逐渐成为产业门类齐全、工业结构完整的区域中心，也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财税第一大户。其在西南的地位，如同上海在华东地区和哈尔滨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地位一样重要。在 1949 年至 1978 年因外部封锁而只能推进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家工业化时代，重庆得以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区域中心和工业重镇，带动了大西南并且顺势在中南亚扩散其商品和文化。

但在 1978 年完成产业资本原始积累之后，中国融入了应产业资本扩张需求而产生的市场化浪潮。重庆不仅在 1985 年西部会议之后提出并且随此前已经展开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税体制“分级承包制”的改革，而实施了带有排斥性增长特征的不平衡的国家发展战略。

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这三大增长极^[16]接续兴起，带动了苏南、浙南、岭南这三个经济活动十分活跃的“三南”次经济中心^[17]，也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在市场化中凸显了经济区位优势的重要性。

诚然，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确在率先融入这三大潮流的时候先富了起来。但在现行的于 1994 年确立的“分税制”的财税体制下，却不大可能出现政治领导人在确立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时特别提出的“先富带后富”。

在这样一个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世纪末运动中，期待三大潮流自动惠及重庆，几乎毫无可能。

问题还不仅如此。

从实践上看，20 世纪末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 20 年，是重庆相对失落的 20 年，政治、经济上优势不再，过去的技术优势和文化优势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全国“一江春水向东流”、向沿海倾斜的极化发展进程中，重庆丧失了原有作为中国西南乃至中亚地区的增长极的区域中心地位，不仅开始扮演配角，而且过去半个世纪构建的完整工业结构被迫解构，各个生产要素很难在本地形成有效配比，只能听任其被市场化的抽水机抽走。

资金外流、人员外流、技术外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为 20 世纪最后 20 年重庆经济地理的一大景观。比如，就劳动力而言，截止到 2007 年，重庆和四川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 706 万人和 2 000 万人，占全国的 13.5%，大部分是转移到沿海发达地区，成为被资本配置的廉价劳动力。

上述“孔雀和麻雀都往东南飞”的状况，与重庆未能具备条件以有效融入上述世界三大潮流直接相关。

从经济地位上讲，沿海地区不必构建重化工业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就可以直接利用外向型的轻型产业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这对重庆这种产业结构

完整的区域工业化中心构成了极大挑战。

这是因为老工业基地构建重化工业时期形成的传统产业，其平均收益率没有市场化的倍差效应，而东南沿海引入的外部投资的轻型产业按“市场化”原则重新配置要素，劳动力成本和社会负担都极低，经理层报酬远远高于传统产业的计划工资；而且，其最具有优势的一点，就是沿海地区的这种轻型工业化，基本上不负担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具有“成本外部化、收益内部化”的对内地贫困地区转嫁制度成本的、明显人为的“制度优势”。此外，还得再加上当时轻工业产品市场广阔等因素。

这些只在沿海地区才有的体制和人为的竞争优势，使得地处内陆山区的重庆轻型工业部门几乎全军覆没，留下的只是那些原来就具有“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内生性地缺乏扩大就业功能的军工和重装备制造业。其所以能够“留下”，也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这些企业的上级部门在中央层次的谈判能力（如重庆钢铁集团、嘉陵工业集团等）。

从政治地位上讲，1986年重庆获得计划单列市的地位，直接和中央建立财政关系。但同期，作为交易成本，也得到了山区的八个相对比较贫困的县。虽然重庆财税上缴并不亚于成都，但重庆成为计划单列市后，人口翻番，地域范围翻番，税负负担更重。何况，这个计划单列待遇的负面后果是几乎使重庆独立于西南地区，对周边的工业辐射作用也日益淡化，成为一个相对孤立的都市。

1997年国家重大项目三峡库区的建设，使得重庆得以进一步独立为一个省级机构——直辖市，同时制度成本更加显著——接受了四川划过来的十多个贫困县。人口与地域面积再次翻番，但生态责任、库区责任很大，短时期内几乎没有成规模的产出。那时候的基层调查指出：重庆不仅是贫困问题最严重的省级单位之一，而且“开发式扶贫”因受资源约束紧张而难有出路——库区和山区农民的产出，不过是人均1头猪、30斤茶叶、300斤稻谷……

虽然再次承担较多的国家层次的战略任务，却难以再次像改革之前历史性的三次外来经济迁入一样获得相应的战略资源，这种似乎不可改变的地缘困局，使得重庆市在2001年启动新一轮改革时，面临着历史性的巨大的资源制约。

在这种具有历史演进意义的重大变化的客观影响下，在中国80年代初期遭遇严重赤字危机压力下推行放权让利，以及90年代在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压力下推进国企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重庆在改革开放以来作出的政治响应和经济表现乏善可陈——原有的传统工业结构中以改革为动力脱颖而出